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嵌入和融合路径

张冬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作为一种凸显线型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利用与传承功能的特性开放空间和公共文化载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有助于实现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文旅融合的多区域协调和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而沿黄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提供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彰显多元一体的民族精神、奠定永续发展的文化自信方面能完美嵌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多重价值体系之中。从最初的立园之本、产生的社会效应和现有的基础条件来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是天然适合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核心和有力抓手。鉴于此,可从原生、次生和再生三重路径入手:通过遗址本体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遗产相统合,擦亮“文明起源”的IP名片;实现遗址阐释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风貌相协合,营造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推动遗址展示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民族品格相融合,建设精神同源的灵魂家园,最终实现两者的高效融合。

**[关键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文化主地标;价值嵌入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22)06-0092-09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和中华文明的具体见证,国家文化公园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凸显线型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利用与传承功能的特性开放空间和公共文化载体。国家文化公园重在“国家文化”,非常强调国家属性也就是“政治文化”,其核心目的在于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利用国家行为加以保护、串联和展示,最终增强历史的信度、文化的深度,让世界进一步认识与理解当今中国,从而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其可定义为“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加强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主要目的,突出公益性和开放性特征,以国家名义进行认定并建设的具有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化交流、旅游休憩、科学研究等功能,融文化内涵和自然环境于一体的特定区域”<sup>①</sup>。

自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sup>②</sup>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建设,其在2019年7月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并在2020年1月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上明确要求谋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sup>③</sup>。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更着重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sup>④</sup>。作为华夏儿

**作者简介:**张冬宁(1985-),男,河南郑州人,历史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21BZX007)阶段性成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3年基本科研费项目“河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E07)阶段性成果。

① 张祝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代价值、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③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载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03/c\\_112542060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03/c_1125420604.htm)。

④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女的母亲河,黄河见证着中华文明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和璀璨的民族品格,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身为讲好“黄河故事”的直接载体,更是我们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关键所在。

鉴于此,如何加强黄河文化的保护、弘扬与传承,进而寻找到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的有力抓手,就成为了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沿黄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和周边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公共文化空间<sup>①</sup>,是一种针对黄河流域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展示的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模式。从其所处的地理区位环境、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非常适合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文化主地标。

## 一、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于世界最本质的符号和特征。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也是最根本的基石<sup>②</sup>。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加速进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要想实现文脉的传承有序,在外部文化渗透的压力下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就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通过大型的文化工程项目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从而进一步唤醒许多沉睡已久的文化基因。而以长城、大运河、长征和黄河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一)有助于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理清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图谱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留下了无数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众多大型古代遗址如灿若繁星般散布于沿黄两岸,见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演变。从旧石器时代的许家窑遗址、丁村遗址、下川遗址等,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中期的仰韶遗址、晚期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等,再到三代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丰镐遗址、曲阜鲁国故城等,以及秦汉以降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等等,以上文化遗产不仅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信度,更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折射出盛世文明的伟大记忆与辉煌成就。通过建设黄河文化公园不仅有助于实现对黄河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与梳理分类,更有益于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顶层设计,做好其分区规划布局、连片整体利用等指导工作,真正实现对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同时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本身亦是中华文明史一部生动画卷,其投射出了中华文明在发展演变中所经历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能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文明起源演变的脉络蓝图,更有助于公众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一人生三问的终极思考,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二)有助于多区域间的合作协调,推动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文明历史悠久,在上、中、下游分别形成了河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岱文化,这些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地域上看,黄河流域范围广阔,贯穿东西九省(自治区),流域囊括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如将历史视野拉长,古代黄河流经的地区还包括了河北、天津、安徽、江苏以及北京。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出台之前,各省市自治区虽然都颁布有针对黄河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文件,但可以说都是长期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境地,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和统筹规划。而作为国家文化的具象表征,黄河国

<sup>①</sup> 国家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试行)》,载自国家文物局官网, [http://www.sach.gov.cn/art/2018/1/30/art\\_2237\\_38336.html](http://www.sach.gov.cn/art/2018/1/30/art_2237_38336.html)。

<sup>②</sup> 胡鞍钢、刘韬:《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文化复兴——兼谈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4期。

家文化公园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共文化载体,其一大突出特征就是公益属性,即强调还绿于民、还文化于民、还园于民的公益理念。其涉及范围如此之广,覆盖人口如此之多,加之身为线型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普遍突出性、文化辨识性与融合贯通性,就决定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必须要走一条多省联动、区域协调的合作之路。同时,多区域间的合作协调亦为推动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提保障。

首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提升了对黄河文化的整体把握。其打破了区域文化间的鸿沟与壁垒,加强了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系,将沿黄多种文化都纳入家国一体、中华一统的宏观视野当中。其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利于深化沿黄九省区的合作机制。作为推动沿黄九省协同合作的有力抓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以放大黄河文化资源的聚合效应,凝聚沿黄城市的开放协作意识,通过召开高端会议研讨、签署相关战略合作协议、设计整体规划布局以切实推动黄河流域区域联动、开放发展、优势互补的合作态势。最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益于推动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统筹谋划、规划建设一批大遗址保护区、博物馆、展览馆、生态园区、农耕文明体验区等,将黄河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深度链接,实现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海岱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科学布局与有机融合,最终借助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塑造“中华母亲河”的文化旅游品牌。

### (三)有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sup>①</sup>这就要求我们应把加强文化认同作为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关键举措,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升至国家战略。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建设目标正是通过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层面的认同,强化不同民族对于家国身份的认可。

纵观中华文化所取得的灿烂成就,黄河文化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黄河文化本身亦是集各民族文化精华之大成者。展开黄河文化的历史长卷,点点滴滴都在讲述各民族文化的互融互通: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这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展示、传承的重要内容,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辉煌历程,共同构成了我们多民族紧密团结的文化基础与精神认同,从而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进步,铸牢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嵌入

身为黄河文化的一种重要具象表征和物质载体,沿黄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将源远流长的黄河文脉进行串联的重要线索,是对波澜壮阔的黄河之魂进行叙事的关键图景,更是把宏大复杂的黄河文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讲得清的“黄河故事”的核心所在。如果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对黄河线性文化遗产资源一次系统梳理,那么沿黄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是这条文化线路上的璀璨明珠,集中展示了黄河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厚重文脉,其自身拥有的多重价值亦可以完美嵌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体系之中。

### (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提供黄河文化源远流长的核心见证

纵观中华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古代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遗址、城子崖遗址、大河村遗址、新砦遗址,还是三代的二里头、偃师商城、周原遗址以及春秋战国的郑韩故城,再到秦汉之后的秦始皇陵、汉阳陵、西夏陵等。可以说见证中国重要历史时刻与关键节点的大型古代遗址大都聚集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史前时期的众多聚落遗址和大型

<sup>①</sup> 新华社记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1年3月6日,第1版。

城址,以及历史时期闻名遐迩的都邑遗址和帝王陵墓,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绵延至今且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

同时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涵盖了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多重文化财产,由于身处中华文明的滥觞之地,遗址公园既囊括了物质层面的古代遗物、遗址和遗迹,也包含了非物质层面的思想传统、风俗习惯,这些都是黄河文化数千年发展延续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古代先民无与伦比的创造性、与自然相处的和谐性以及思想精神的深邃性。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是黄河沧海桑田巨变的历史见证,反过来也投射出黄河文化源远流长的融合演变,证实了黄河文化在推动整个中华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彰显黄河文化兼容并包的多元一体

沿黄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水乳交合之地,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蕴含着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是大明宫、隋唐洛阳城等宏大工程,抑或是“汉字”“河图洛书”“四大发明”“二十四节气”等伟大创造,其都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身影。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讲述自身历史的同时也是在彰显黄河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描绘各民族共同开疆扩土的悠久历史。从先秦时代起,中华大地的锦绣河山就是在各族先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拓中奠定了蓝图。通过将众多见证民族融合、开疆扩土的重要历史遗迹加以系统保护、重点展示与有效传承,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充分证明黄河流域的中原先民与边疆民族是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核心凝聚“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让每一位来到园区的公众都深刻感受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光辉历史。

###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奠定黄河文化永续发展的文化自信

文明的延续不仅要靠内在的文化结晶来树立文化自信,更需要外部的不同文明交流来相互获取优秀的文化资源。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是实现内在文化自信与推动外部文明互动的有力驱动。从内部来看,其见证了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引领和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而从外部来说,这些重要大型古代遗址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成就,这种结晶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让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群互相欣赏着彼此的历史传统,尊重着差异的价值观念,学习着对方的科学技术,最终让中华民族在与世界交流碰撞中激发出永续的生命活力。

与此同时,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能更好满足广大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区域社会的持续发展。从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来看,作为一种大规模、综合性的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模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非常切合当下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现实需要:其不但能充分激发文化遗产自身的活力,真正发挥爱国教育、人文游憩等功能,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且能为经济发展建设与文化保护中的矛盾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

##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合的优势基础

### (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园之本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根魂本质天然契合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sup>①</sup>,明确了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政治站位与根本基调。所谓“根和魂”,解决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为进一步实证“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之根”,同时又彰显“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取向

<sup>①</sup> 寇江泽、姜峰、侯琳良:《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1版。

和审美取向之魂”，就需要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物化载体，通过物质层面的展示辅以精神层面的引导，进而发挥出以上应有的功能与效用。

早在设计之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将保护对象聚焦于考古成果丰硕、遗址现状完好、历史文化价值重大的古代大型遗址，其立园之本就是让这些“沉睡”已久的大遗址抖落身上的层层尘土，焕发出勃勃生机。通过严谨缜密的保护规划和对遗址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依托多种新兴展示技术的交叉呼应，从而对中华文明的渊源流长和多元一体娓娓道来。这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所肩负的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与融合的历史责任可谓一脉相承。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民族发源于此，中华文化发轫于此，这里不仅富集着众多历史遗存、文化景观，更孕育出了“最早的中国”<sup>①</sup>。正是在黄河母亲的丰富滋养下，诸多区域的史前文明中唯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明绵延不断持续发展，在龙山时代如漫天星斗般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脱颖而出，最终呈现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前身伊始。

除此以外，作为中华先民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沿黄流域还保留着众多气势恢宏、规模庞大的古代遗址，如新石器时代见证人类进步和文明曙光的双槐树遗址，王国时代的夏商周三代都邑，历数帝国辉煌的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东京汴梁城等，可谓不胜枚举。这些沿黄大遗址不仅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点建设对象，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精神内核的物质外延。依托以上重要考古发现，无论是作为东方文明标志的儒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还是“建中立极”的中轴线都城布局理念，以及隋唐科举制、北宋文官制等重大政治制度变革都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这些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生态、塑造中华民族集体品格、推动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核心要素，都可以在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找到全方位展示的物化载体。

###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社会效应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

我国最早的遗址公园的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80 年代，彼时为了应对快速城镇化对城区古代遗址的冲击与影响，形成了一批以圆明园、殷墟、元大都为代表的由政府主导，经统一规划，以文保为主、科研为基的遗址公园。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后，伴随着《“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等相关指导性文件的公布，国家文物局在 2009 年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拉开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帷幕。应当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理念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维度，从最初的解决城市用地与遗址本体保护之间的矛盾，来到了如何加强相容使用和创新展示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新阶段。

之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试行）》亦明确指出遗址公园除去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保护、考古发掘研究、文化教育传播和参观旅游休憩等基础功能外，还要遵循实际情况凸显社会层面的效应。无论是宏观层面的促进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还是中观层面的调整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周边环境治理，亦或是微观层面的改善社区设施、解决当地人口就业、提供居民活动空间，这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目标可谓涉及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应当说以上目标要求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要利用黄河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充分激活沿黄两岸的历史文化资源潜力，用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方式满足城市、城郊和乡村等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要求，坚持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方针，充分发挥园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普及教育、社区人文关怀等社会功能，建立一个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识、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公共文化体验空间。

###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现有基础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求无缝衔接

自 2009 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展以来，当下沿黄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sup>①</sup>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在经历了十三个春秋后已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大量遗址公园目前已经完成了园区的全部建设或一期建设任务,进入了完全对外开放的阶段,保护和利用的各项条件已基本完备。下以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首先,园区规划布局合理,遗址重点突出。自2005年被列为“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大遗址项目后,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于2010年正式开工建设。遗址依托隋唐洛阳城的形制,聚焦于唐神都洛阳宫城——紫微城遗址的核心区域形成了以明堂、天堂、应天门三处遗址为中轴,附带宫城西部皇家池苑九州池遗址为主体的“一区一轴”总体布局。其中明堂是唐洛阳紫微城正殿,又称万象神宫,位于宫城中轴线上,是祭祀天地、宴飨群臣、举行神功大乐舞的朝堂所在;天堂则是武则天的御用礼佛堂。两处遗址充分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理政、礼佛、生活的重要场所。应天门又称五凤楼、顺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正南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两重观,三出阙”是中国古代礼制中最能彰显天子身份和地位的建筑形制,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等级最高的城门楼遗址。

其次,园区本体保护完备,展示手段多样。整个园区目前占地145亩,总投资约7亿元,针对遗址本体保护原真性的原则,三处遗址的保护展示建筑外部均采用仿唐风格外观,内部使用大跨度钢结构设计,利用抬高建筑台基的形式,对地下遗址进行了360度的全方位展示,并充分利用上层空间将其建设成为遗址博物馆进行展览讲解。建成后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宏伟壮观、气象万千,通过本体展示、场景复原、实物模型、艺术品仿制、多媒体互动、AR现实增强技术等展示手段,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代都城规划理念,更充分彰显了“中兹宇宙,均朝宗于万国”的盛唐气象。

最后,园区服务设施完善,文创成果丰硕。作为一座强调“穿越历史,再现神都”的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的各项硬件服务设施已趋于完善,无论是基础的标识解说、景观绿化、道路交通、游客服务等硬件设施,还是利用IP开发的“唐妞系列”“洛阳印象系列”“盲盒系列”等涉及衣食住行多个层面的文创产品,都基本满足了园区游客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诸多需求,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沉浸式的游玩观赏体验。

应当说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过多年的前期筹备和大力建设,遗址的整体规划、本体保护、展示技术,以及交通、服务、餐饮、娱乐、购物等硬件设施,都已经十分完备。不需要在将其赋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属性的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二次改建,只需对其导览线路、遗址讲解、场馆策划等软件方面进行规划链接,纳入黄河文化的大视野之中。

#### 四、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合的重重路径

将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文化主地标,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首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将沿黄地区的所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纳入到宏大的黄河文化叙事体系中,赋予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从而加强区域联动,扭转各个遗址公园各自为战的零散局面,同时也使热门遗址公园的带动冷门遗址公园形成一个园区间的良性循环;二是应通过“中央政策+地方主导+市场参与+专家指导”的方式,在保障遗产本体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利用好各类社会资本,缓解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和财政压力。在具体实施融合战略的过程中,可考虑从以下三重路径入手。

**(一)原生路径:通过遗址本体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遗产相统合,擦亮“文明起源”的IP名片**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见证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的起源历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就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划分为黄河农业生产区和长江农业生产区,并依此进行了区系类型分析,之后赵辉、栾丰实等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总结为八大区系,即黄河流域的甘青地区、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长江

流域的巴蜀地区、江汉地区与江浙地区,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来到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两大农业生产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重叠,多种文化类型在此汇聚融合。正因如此,黄河中下游集合了粟作和稻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邑规模的扩大、手工业技术的提升,炎帝、黄帝、蚩尤、太昊、颛顼、帝喾、尧、舜等部族都逐渐向黄河流域靠拢,中国历史进入了五帝时期。到了五帝时期晚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等都出现了衰亡的迹象。而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一方面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性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用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着周边文化的先进要素。此种态势经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更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之后的走向,即使经历了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等多个时期的冲突、碰撞与分裂,但最终都会重现“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格局。

因此可从原生路径出发,在最大限度保护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基础上,依托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博物场馆等文化展示空间,统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关联紧密的物质遗产如古文物、古建筑、石窟寺与石刻、古墓葬、古街区等,进而做好顶层设计,编制出“一轴两期三代文明圈”宏观融合规划。从而将黄河流域的多重遗产要素进行整体概括和统领,既可以一统相关的所有物质遗存,使其传达出一致的信息,便于公众在后续展示过程中体验到栩栩如生的历史空间,理解黄河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关键贡献之所在,打造出“文明起源”这一核心IP。具体融合过程如下:

首先,“一轴”是指以大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分布为核心,参照考古学系统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所建立起的“中华文明演进时间轴”,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演进画卷。其次,“两期”是指在“一轴”的基础上一方面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仰韶村遗址、半坡遗址、双槐树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遗址、滕州岗上遗址,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遗址、石岭下遗址等诸多文化遗产资源相统一,构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漫天星斗”般的“文明裂变期”,实证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是从一个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而是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左右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诸多地区如满天星斗般的各自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通过“裂变”形成了各具特征的文明因素,加剧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产生了飞跃式的质变<sup>①</sup>;另一方面将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庙地沟遗址、西坡遗址、泉护村遗址,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遗址、后岗遗址、王油坊遗址,山东龙山文化的两城镇遗址、尧王城遗址,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客省庄遗址、姜寨遗址,齐家文化的齐家坪遗址等诸多遗址的文化要素进行融合,组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万邦闪耀”的“文明碰撞期”,充分体现龙山时代众多古国在“碰撞”中相互借鉴先进文化因素的文明发展态势。最后,建立起以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圈”,以二里岗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商代文明圈”以及以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和洛邑遗址为代表的“西周文明圈”,从而让夏商周三代的不同文明时段都有切实的物质载体而变得脉络清晰,搭建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三代文明融合圈”。通过“一轴两期三代文明圈”的宏观融合,可以让沿黄地区较早时段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中华文明裂变、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一个明晰的定位,扬长避短的弥补了大遗址缺乏直观性的缺陷,最终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描绘出一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全景图,擦亮了“文明起源”的IP名片,为后续线型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核心标识。

### (二) 次生路径:实现遗址阐释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风貌相协合,营造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

无论是带来中华文明曙光的史前聚落遗址,还是气象万千的都城遗址,他们都是古代先民劳动创造和改造周边自然环境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阐释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要通过尘封已久的地下遗址体现出不同时期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治理体系,这种“透物见人”的阐释要求恰恰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sup>①</sup> 李新伟:《裂变、撞击和融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目标高度契合。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则主要依托于黄河众多的文物古迹所塑造出的历史文化风貌,因此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阐释方式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风貌的和谐一致,不仅有助于达成两者的核心目标,更有助于营造出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

在实现遗址阐释与文化公园文化风貌相协合的过程中,首先应辨析两者的异同之处。所谓遗址阐释其实就是对是大遗址提炼出的多种遗产要素的整合、关联与扩展,其由内核和外延两个层面构成。内核是关键之所在,是对信息要素的整体性概括和抽象性总结;外延部分则对应遗址不同类型的遗产要素的具体特征,是内核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延伸,可由时间、空间和人这三个维度构成,应既能关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史事件,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能结构,亦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宇宙观)<sup>①</sup>。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风貌则是由园区历史文化要素的不断积淀而形成的一种风格和面貌,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诸多要素积累而成的“文化意象”,是人们对身处的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心理图像或心理印象。可以说两者都是一种对复杂信息的集合体,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对信息的提炼,后者则是信息的积累。

因此,在次生路径的融合过程中,从遗址阐释最初的信息提炼和延伸设计上,就要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所沉淀而产生的“文化意象”融入其中,进而共同营造出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以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在充分考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明起源”“文字起源”“城市起源”“国家起源”等“文化意象”的基础上,可将阐释内核概括为“为杰出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字语境下的早期历史、古代信仰、社会体系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物质证据”,外延则可围绕“为商代晚期的都城确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布局和陵园制度”“彰显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文化交流”“代表了古代东亚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等方面展开。从而结合历史文献,参照保存良好的古代建筑范式,将以上阐释内容作为遗址公园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性复建规划的主要参考。同时亦可结合时人的社会治理观、价值观和宇宙观等形而上的内容,复原当时的政治祭祀活动、生产制造技艺和日常生活活动,充分营造出一个经历漫长发展、以血缘纽带和地域纽带为基础,拥有复杂而稳固的对外统治网络和祭祀系统的高度文明的王权国家<sup>②</sup>,以满足公众对于深入体验商代文明的诉求。

### (三)再生路径:推动遗址展示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民族品格相融合,建设精神同源的灵魂家园

身处中华文明滥觞之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一方面可以依托物质层面的古代遗物、遗址和遗迹,投射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融合演变脉络,成为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延续而不曾中断的历史见证,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针对先祖遗留下来的多重精神财富,如非物质层面的文学作品、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等,充分体现华夏先民勇于创新的创造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以及社会治理的先进思想。从而梳理出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品格。在黄河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源源不断汇入中华儿女的精神特质之中,无论是历史时期的大禹治水、汉武帝“瓠子堵口”、潘季驯“束水攻沙”等与黄河水患斗争的英勇事迹,还是《将进酒》《浪淘沙》《凉州词》《行路难》《使至塞上》《登鹳雀楼》等流传千古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忧患悲壮的家国情怀,抑或是隋唐长安城、东京汴梁城等国际性贸易大都市所拥有的海纳百川的气势胸怀,都无一不在彰显各民族共同熔铸而成的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勇于创新、崇德尚仁、兼容并包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品格。

如果说原生路径是从物质本身出发,次生路径是物质的延伸,那么再生路径则是对物质的升华与再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方式是多层次、多维度的,除去基础性的原貌展示、模拟

① 张冬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何阐释和转化其核心遗产价值》,《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19日第6版。

② 张光直:《商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5-166,395-398页。

展示、覆盖展示、标识展示和复原展示等方式外,还可以结合现有最新的展示技术如VR(虚拟现实技术)、AR(现实增强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以及元宇宙等虚拟展示空间,利用遗址博物馆展示、在线网络展示、多媒体宣传教育展示、大型沉浸式展示等方式,将遗址公园所蕴含黄河文化精神实质展示出来。如可通过“遗址本体+VR 在线+短视频讲解”等展示方式,聚焦双槐树遗址的桑蚕牙雕、陶寺古城的古观象台、登封王城岗和新密古城寨的城壕布局及版筑技术、二里头遗址的“井”字型道路布局及都城规划和青铜冶炼技术,讲清楚以上考古发现对于实证黄河文化是在不断创新中赓续着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深入展示大遗址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勇于创新”的民族品格。再如可通过“遗址博物馆展示+复原展示+大型沉浸式展示”等方式,针对最早中国的二里头遗址、恢弘雄伟的汉长安城遗址、气象万千的汉魏洛阳城遗址等,重点展示其所见证的炎黄时期多部族的融合、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形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多民族的交融,深入阐明其所蕴含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意识,最终展示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精神品格特质,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对于家国身份的文化认同,共同建设好我们的灵魂家园。

(责任编辑:刘丽)

## The Value Embedment and Integration Path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and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Zhang Dongning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 As an ope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carrier that highlights the prote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and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uti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bears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will help realize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heritage, the multi-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can be perfectly embedded in the multiple value 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n terms of providing the long-established historical witness, demonstra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of pluralism and un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the park, the social effect and the existing basic conditions,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s naturally suitable for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s the key core and a strong handle. In view of this, we can start from the original, secondary and regeneration path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te and the physical heritage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olish the IP card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site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o create a scene of historical spac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te displa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build the soul home with the same spirit,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Key Words:**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j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marks; The value of embedded